

ZHIYI YU DUIHUA

质疑与对话

20SHIJI HOUQI
ZHONGGUOXIAOSHUO
JIAZHI XIANXIANG YANJIU

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价值现象研究

涂险峰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SHIJI HOUQI
ZHONGGUOXIAOSHUO
JIAZHI XIANXIANG YANJIU

质疑与对话

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价值现象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质疑与对话:20 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价值现象研究/ 涂险峰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7

ISBN 7—216—03991—2

I. 质…

II. 涂…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484 号

质疑与对话

——20 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价值现象研究

涂险峰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黄冈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5

字数:218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书号:ISBN 7—216—03991—2/I·349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感性个体对历史理性的怀疑与叩问	10
第一节 当代小说中的创伤记忆与价值现象	13
第二节 创伤叙事对历史理性的遮蔽	31
第三节 消解历史理性的叙事意向	62
第四节 感性个体的不确定性与价值迷惘	82
第二章 作为价值现象的“寻根”话语	102
第一节 寻根:返回事物本身?	102
第二节 寻根意向中的“解释学循环”	121
第三节 家园意识与自由意识的双重变奏	135
第三章 商品化世界中人的价值的无根性	149
第一节 欲望化叙事与价值的遮蔽	151
第二节 僭越的价值尺度与空幻的终极陶醉	163
第三节 迷失于角色之中的自我	174
第四节 商品化造就的犬儒主义	188
第四章 神圣超越追求与游戏狂欢精神	208
第一节 神圣的姿态与虚无的内核	208
第二节 严肃的亵渎与戏谑的狂欢	233
结 语	256
参考文献	261
后 记	268

绪 论

人文科学研究之要义,在于拓展和深化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在关于人类自身属性的种种描述中,有不少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诸如:“人是能够劳动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①、“人是思维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等。如果将这种描述方式延续下去,继续以枚举人异于动物之秉性来阐释人类,那么,我们或许会得出一个同样不无真理性的结论,即:人是“能够进行价值判断的动物”。

价值,乃是人的存在的基本维度。如果说,“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界,那么,“价值”则在其完整意义上是“属人”的。价值随人类而生,与人类共存。就中国而言,文字问世之初,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屡次出现“吉”、“凶”、“祸”、“福”、“善”、“美”、“爱”、“恶”、“公”、“丑”甚至“大吉”、“至吉”等评价人的道德、行为或事物的价值语汇^②。在西方,系统研究人类价值的哲学,虽诞生于19世纪,但关于价值的思考和研究,却源远流长,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从柏拉图起,哲学家们就一直在善、目的、正当、义务、美德、道德判断、审美判断、美、真理和合法性的标题下,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③。

人类发展至今,价值现象和价值话语遍布社会:从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好坏善恶美丑等判断,到人生的目的、意义以及所谓“终极关怀”等,均为价值现象之体现。对人的价值现象进行探索和研究,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人文科学重要的一环。

① 关于“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论点,参见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殷墟文字甲编》,406页、2054页,转引自敏泽、党圣元:《文学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4页。

③ 富兰克纳:《价值与评价》,见敏泽、党圣元:《文学价值论》,10页。

价值研究,不仅是人的自我认识的需要,而且更关乎人类生存与人类命运。社会历史变迁,时代风云变幻,往往伴随着价值秩序的剧烈震荡。

纵观 20 世纪,从西方到中国,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延绵不断;从“五四”运动到“新时期”,“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声不绝于耳。事实上,价值的冲突更迭与困惑迷惘充斥于其中的时代,价值研究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大有可为。

价值随时代、文化、地域的不同也迥然相异。对于人类价值的研究,无须以一劳永逸地建立统一观念体系为目标。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大一统价值秩序的强求,常常就是人类矛盾冲突的来源。只有在承认价值的相对性和多元性的前提下,通过价值对话,才可能达到相互理解,和谐相处。因此,价值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回到时代具体的价值现象,而不是回到某些“天经地义”的价值法则和价值尺度。对特定时代的具体价值现象进行研究,是我们学术探讨的着眼点。

价值现象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但为什么要研究文学中的价值现象?或者说,文学中价值现象的探讨,对于整个价值现象研究具有什么特殊意义?

理由首先在于,文学是时代价值嬗变的重要反映,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价值现象。一般说来,价值现象最集中地体现在价值变迁和冲突之中。冲突和变迁不可能仅以抽象的、纯思辨的方式进行,而是具体生动地体现于人的生存、行动和命运之中,并强烈地诉诸人的情感和心灵,这些,通过文学才能更为真切地呈现出来。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理由在于:文学不仅是价值的反映,同时也是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实践的“公共话语活动”,因此在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渗透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媒介作用。这意味着,对于文学中所呈现出的价值现象的研究,不仅服务于价值的探究,反过来还可作用于文学创作,并最终对时代价值批判和精神建构发挥作用。文学话语较之各种学术话语,在反映和影响时代价值观念这两方面,其广度和强度都是难以替代的。

如果继续追问,接踵而来的便是:为什么在各种文学体裁中,要研究小说价值现象?较之其他体裁,小说的独特性何在?我以为,文学各体裁中,在反映时代价值嬗变方面,尤以小说为盛。这不仅是由于在当代诸文体中,小说最为繁荣,内容最为宏阔,还在于小说是以叙事为主的方式来反映时代。曾有不少学者对小说这一文体的特殊性作过阐述。比如,美国哲学家罗蒂在批评海德格尔思想所具有的、囊括一切的整体化倾向时,指出这一倾向与海氏哲学将荷尔德林诗歌作为思考的原型有关,与此相反,罗蒂则肯定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理论^①。后者强调小说精神在于“通过叙事对道德(价值)判断进行延宕”,通过叙事使人陶醉在价值的相对性之中^②。罗蒂的论述意味着在阐发价值思想方面,至少存在着两种模式,即诗歌模式和小说模式。当然,绝对和笼统地将诗歌模式等同于整体性和一元论,将小说模式理解为多元论和相对化是荒唐的,但这一描述却也切中某些实质。昆德拉的小说观,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颇为相似,他本人的小说创作也大量采用了复调手法^③。而在巴赫金看来,俄国哲学家如罗扎诺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在通过陀氏小说阐发哲学思想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些思想不过是在小说内部进入对话关系的多元思想中之一元^④。昆德拉和巴赫金都肯定了小说中价值的多元多样特性,这意味着,小说不(应

① Eliot Deutsch edited, *Culture and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1991.

②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

③ 在昆德拉的《笑忘录》、《不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作品中,这些“复调手法”颇为突出,但与巴赫金所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小说有一定区别。参见拙文《对话的可能与不可能及复调小说》,《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2期。

④ 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32页以下。

该)是单一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应该)是多种思想和价值参与对话的艺术空间^①。小说之所以能够提供如此宏大的价值对话和思想冲突的空间,就在于其叙事特性。以小说为出发点和基本比喻模式的文学价值论,强调了各种价值的相对共存状态,不是通过作品去寻求绝对价值,而是以文学的娓娓叙事展示世界的非绝对性。叙事将人的价值世界、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包括其中的细枝末节,作为多元并存的浑然整体“挫于笔端”。这种呈现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涵盖力是其他许多文学体裁难以企及的。当然,始终应该强调的是,这只是大体上的区分,如果作绝对化的理解,相反的例子自非无处可寻。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中国小说,经历了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价值递嬗过程。国门重新开启之际,各路西方思潮鱼贯而入,古老民族文化再度复兴,从传统的人文主义到种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直至后现代理论,从弗洛伊德、尼采、萨特到老庄佛禅,从世俗商品化到基督、伊斯兰信仰,林林总总的价值理念此起彼落,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这一时期的小说成为古今中外几乎一切价值对话的场所,但是,其中丰富的价值现象与混杂的价值话语呈并存局面,这同时决定了我们深入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并非价值现象史,无意于对 20 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中的一切价值现象进行穷尽性的统计和梳理,而是在价值对话场中,以问题为焦点,通过对核心价值现象的探讨,使种种价值话语得到澄清;通过小说叙事所留下的精神见证,对这个时代人们曾经强烈关注过的价值现象作出进一步的反思,力图减少未经充分反思的价值话语带来的遮蔽,达到对这些价值现象更深层

^①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小说都是昆德拉所谓“塞万提斯遗产”的继承者,或备受巴赫金青睐的陀式复调小说。思想单一,价值旨趣贫乏的小说也不鲜见,但是,小说为种种多元价值对话所提供的空间之宏阔,却往往为其他体裁所不及。

面的领悟。这一根本学术意图,决定了本书的思考路径和结构方式,乃是以一系列问题贯串全局。

体现时代嬗变的核心价值现象,往往蕴集于影响巨大的文学思潮之中。所以,我们探讨的价值问题,有时相对集中于某一思潮,研究范围与特定潮流中的价值题域发生重叠;有时又不限于这些思潮,因为其中一些价值问题,往往在思潮退落之后,才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或拓展,而另外一部分,本来就散见于迥然不同的创作派别之中。

本书分为四章,分别围绕感性个体与历史理性的价值冲突、寻根话语中的价值意向、商品化大潮中人的价值状况以及神圣超越和游戏狂欢的价值对峙等问题逐一展开。这些价值现象,都曾在当代小说中浓墨重彩地予以表现。

其中,对于寻根价值意向的分析,基本上未在寻根小说思潮之外另觅论证依据。商品化价值问题,则较为集中地体现于 90 年代以来书写商品化都市景观的所谓“新生代”小说中。它并非如寻根文学那样形成思潮,但在崛起之时,也曾备受 90 年代文坛瞩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一章和第四章。这两章所涉及的主题,即“感性个体与历史理性”,“神圣超越与游戏狂欢”的纠葛,均为价值对峙之“公案”。它们的内容并不局限于中国当代某一时段或流派的小说创作,但也非毫无侧重。由于“创伤记忆”是感性个体质疑和叩问历史理性的出发点,这一价值纠葛更多地存在于新时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中。但对此命题的探索,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所以,该章所剖析的小说文本,既有《班主任》、《大墙下的红玉兰》、《晚霞消失的时候》、《第十个弹孔》、《绿化树》等伤痕反思文学的早期代表,也有稍后发表的《蛇神》、《血色黄昏》,乃至 90 年代的《大年》、《国殇》等所谓“新历史小说”,以及《习惯死亡》、《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丰乳肥臀》、《务虚笔记》等有关长篇小说。第四章所探讨的神圣超越的价值现象,并未见诸巨大的文学思潮,而是蕴涵于张承志和北村等作家之“特立独行”的小说创作和精神探求中。追求神圣超越价值的代表作家虽为数

寥寥,却为当代小说的价值探索开辟出重要的一维,并且在同游戏狂欢精神的激烈对峙之中,产生引人瞩目的社会文化影响。忽略或漠视其意义,对于当代价值现象的探究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本书的主体章节,以小说叙事为依托,致力于对笔者胸中萦绕盘桓的一系列重要价值问题进行剖析,并尝试作出解答。

第一章围绕小说中的“创伤记忆”,探讨历史理性主义和感性个体本位的价值冲突。这一章的核心问题是:“创伤记忆”作为感性个体怀疑和叩问历史理性之合理性的出发点,是否必然导致价值的澄明?当代小说中的“创伤记忆”,何以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分野与观念对峙?其中一部分创伤叙事,是如何遮掩和庇护历史理性主义价值意向的?另一些作品,又是如何试图消解这一价值的?“创伤记忆”在历史理性与感性个体的价值冲突关系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具有什么影响?最终,感性个体的不确定性和内在悖论怎样阻碍其自身成为新时代坚如磐石的价值基础?

寻根文学试图在意识形态的对峙语境和张力关系之外来开辟新的价值题域,寻找新的价值依据。他们找到的是文化价值,尤其是潜藏于民族古老传统和边缘蛮荒地域中的文化价值,以此作为价值建构的基石。这一美好的价值“奠基”意图引发的探寻和追问,便是本书第二章的内容。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第一,寻根小说究竟是如其理论倡导者所言,回到了“事物本身”,达到了所谓“无我之境”,还是表现出鲜明的价值诉求?第二,寻根意向中不可避免的“解释学循环”,对寻根价值诉求造成什么实际影响?第三,“家园意识”和“自由意识”在寻根小说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看待这两种意识交织并作而成的价值意向?

价值之递嬗,既有主体自觉寻求而来,也有现实生存状态流变所致。商品化大潮席卷神州之时,小说中所呈现的价值图景之变迁,亦召唤新的关注与思索。作为20世纪90年代都市小说叙事的核心价值现象,商品化在第三章里渐次呈递为如下问题:小说中层出不穷的欲望化叙事与商品化价值语境之间关系怎样?本是商

品价值尺度的金钱，却僭越成为人的价值尺度乃至人生的终极目的，这一在小说中屡被表现的价值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体现何种价值境况？人的“自我失落于角色”这一小说主题，与商品化条件的联系何在？商品化造就的“犬儒精神”，在当代小说中具体表现如何？这种价值诉求的终极指向和“最后宿命”是什么？

商品化及其他“俗世价值”在一些具有“神圣超越追求”的作家那里遭到坚决抵制，但是，与后者形成“结构性”对峙的价值诉求却是所谓“游戏狂欢”精神。

第四章探讨的对象正是这一复杂的价值纠葛。张承志和北村小说中的神圣追求，能否为当代人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这种超越性价值取向，如果对于诉求对象的神性存在缺乏本体证明乃至实质性关注，是否可理解为某种“神圣的价值姿态”？这种“姿态”的内核是否依然为虚无？或者仅仅是可以填充任何内容而不改其实质的“空洞”？或许仍与某些俗世情怀难脱干系？笔者在这一章节中，对于上述“神圣姿态”，怀疑与理解并存。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是否通常被称为游戏狂欢精神的价值取向，与崇高严肃之信仰必定天然对立？游戏狂欢价值对于神圣超越的价值建构是否一定毫无建树？笔者在这一部分论述中，对此亦表示出有保留的质疑。

此外，有必要对本书处理问题的方式作一些补充说明：

首先，作为以价值问题的探讨而非以书写价值现象史为主旨的学术著作，本书在自身题域之内，有时将彼此之间并无直接联系的作品和价值现象组织在一起。笔者坚持认为，对于由问题贯穿全篇，以问题的深入探究为目的的学术研究而言，这种跨度较大的“横蛮”组合，未必是不可以尝试的。

其次，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所论及的价值现象，有些见诸作品主人公，有的则属于作品本身。文学常识告诉我们，作品中的人物、作品以及作者的价值取向是有别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情形多样的。有时作者的价值倾向同主人公一致，有时则相反，有时在主人公彼此之间，以及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存在

着价值观念的异质并存和平等对话关系^①。本书无意于将不同主体所持有的价值混为一谈,但是,在确立研究对象范围时,对作家与主人公的价值意向未作严格甄别。这并非源于无意的疏忽。之所以如此,乃是基于如下信念:小说中出现的一切价值意识,无论属于作品、作者还是主人公,在我们的论域中都具有同等地位。笔者认同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态度:对于所有的现象,应给予平等的尊重。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本书重在描述和剖析,意在使出发点互不相同的各类价值现象和价值话语的“遮蔽”得以“去蔽”,使埋藏于价值话语和价值意识深处的意味得以彰显。对这些价值现象的正误高下进行评判,并非本书的主要目的。自然,在行文之中,笔者的褒贬抑扬并非无迹可求,但决不想使之简单、轻易、廉价和一劳永逸,而且,这些主体倾向必须留待分析之后,或从剖析描述之中逐渐显现。所以,应尽量避免从某一未经反思的价值断语出发来评判一切。毋宁说,种种可能成为出发点的价值话语,正是需要探讨、需要反思的对象。如果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大举评判”,也就无须对当代纷纭繁复的价值现象进行条分缕析,甚至本书的写作也是多此一举的。

概而言之,作为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价值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初步尝试,这项研究力图达到以下目的:第一,通过剖析当代小说价值现象,廓清价值话语的种种遮蔽;第二,从价值层面探索和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第三,以此反观当代中国小说创作,通过对作品的文本分析,在精神层面上对创作实践有所促进。

因此,本书不仅仅是一种纯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对当代文学规律性的把握,或对作家心理内涵的挖掘,或对小说创作技艺的归纳,而是试图通过叙事文本中的价值话语,揭示人的精神现象,

^① 在探讨这些关系方面作出独到贡献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发现的,正是这种多声部的复调式的价值关系,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对同时代人的价值实践和伦理实践产生一定影响,参与时代精神建构。它本质上属于对“人”的研究,但对文学本身或许亦不无意义:希图使文学对人的存在的功能和意义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当然,这是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我并不奢求凭微躯之力,倚薄文之功,就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步子一旦迈出,目标就不再显得那样遥不可及。

第一章

感性个体对历史理性的怀疑与叩问

在德国作家歌德的伟大诗剧《浮士德》第五幕里，白发苍苍而壮心不已的浮士德老人于宏伟的号角声中，展望着创造崭新世界的壮丽前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向新天地豪迈进军的步伐。然而，就在他筹划建造一座远眺这一伟大创造过程的瞭望塔时，一对老夫妇的古老住宅出现在视野之中，妨碍着这一计划的实现。为浮士德效劳的魔鬼靡非斯特被派去解决问题。魔性难改的靡非斯特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法：一次狰狞的惊吓和一把大火，使老夫妇连同一位试图反抗的房客命丧黄泉。魔鬼为浮士德的伟大事业清除了障碍，但也给他的事业蒙上了一丝阴影。随后，四个幽灵潜身而来，其中，“忧愁”之幽灵轻轻一口气吹瞎了浮士德展望未来的眼睛^①。

据说，“忧愁”由浮士德伟大事业中的非人道因素带来，又因为这是代表历史方向的进步事业所不能避免的，所以，“过失”的幽灵并不能伤害主人公^②。事实上，因忧愁而失明并未使浮士德意识到事业的悲剧性，反而令他产生某种幻觉，陶醉在对于美好前景的想象之中，作出了他一生上下求索的“智慧的最后断语”。浮士德想象着千百万居民在新天地安居乐业的

① 董问樵译：《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651～663 页。参见郭沫若与钱春绮译本。

② 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210～212 页。

美丽图景，在这伟大事业的光环之下，不幸牺牲的个体终于被忽略和遗忘了。

在作者歌德和读者的意识中，浮士德的探求似乎也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歌德的同胞，那些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看来，这就是历史发展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是通向未来的伟大进步，是不可阻挡而必须顺应的。个别人的牺牲，不足以成为否定历史进步的理由。这种牺牲虽为悲剧，但却是“充满意义”的，是为了在更高的历史阶段获得更大的收益。上述观点，构成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理性主义”或曰“历史理性本位”的价值取向。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求承认“历史规律”的存在和“不可阻挡”，并对这些“规律”作出预见和描述；将个体自动顺应这种“规律”视为“理性”的要求；此外，出于对历史进步的“积极乐观”信念和对“理性”的服膺，要求将历史进程中个体的牺牲看作必然、必须，进而也是合理的。

但是，在一批作家和哲学家那里，历史理性却遭到了坚决的、毫不含糊的抵制和拒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后期的托尔斯泰，从克尔凯郭尔到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等人，坚持个体立场，质疑一切被视为不可移易的客观性、规律性、理性的所谓绝对价值。在他们看来，规律虽客观存在，但并不能解决处于深渊之中的个体之孤苦无告，不足以成为个体认信的可靠的价值依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饱受侮辱与欺凌的心，足以叩问一切历史理性的合法性基础^①。别尔嘉耶夫则从个体自由出发，对一切奴役人的“客体化”力量进行了强烈的批驳，包括历史理性的诸种表现^②。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如《罪与罚》、《群魔》、《卡拉玛佐夫兄弟》莫不如此。对“历史理性”的批判参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376～377页。

② 参见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这些作家和哲学家质疑历史理性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在历史客观进程中备受创伤的孤苦的个体,以他们的鲜血和眼泪之名进行质疑,而质疑的对象则是将这种灾难、痛苦赋予某种历史意义的一切“理性”尝试。在对待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发生在无数个体身上的灾难和创痛时,历史理性和感性个体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基本价值立场。

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文学,也起源于对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历史灾难的反思,也以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作为开端。在小说领域,一批被称为“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作品应运而生,构成“新时期”之初重要的文学景观。历史创伤的记忆给整个新时期小说定下沉重的基调^①。即使作为文学流派思潮的“伤痕”与“反思”小说退潮之后,以各种千变万化方式显现和见证着伤痕记忆和灾难反思的作品依然存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宽泛概念的“反思文学”一直延伸到90年代^②。

如果说,历史的“创伤记忆”可以成为向历史理性发出叩问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当代文学、当代小说以创伤记忆和历史反思为开端及贯穿始终的精神脉络,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某种“历史理性主义”的观念,也曾长期支配中国人的价值走向,那么,

① 洪子诚先生指出:“这种责任承担,使有关‘历史’清算和(群众的和个人的)‘历史记忆’的书写,几乎是80年代作家或有意,或无意的选择。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域,精神意向上的”;“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这里的沉重、紧张,既是指感情‘色调’,但也指结构形态,作品的质地”;“从情感‘色调’而言,有那么多悲剧性事件需要讲述,那么多长期被压抑的情绪需要释放、宣泄,那么多的社会、人生问题需要探讨,而若干基本概念也需要重估”,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50页。

② 李复威:《贯穿于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一条血脉——“反思文学”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年4期。

当代小说中“创伤叙事”之蓬勃崛起,是否意味着将“历史理性主义”和“历史进步的合理性”等一系列价值话语置于可疑的地位,需要对个体伤痕和历史灾难的实质作出无蔽的回答?然而,怀疑并不能代替有效的反思,体现时代“创伤记忆”的文学所蕴涵的追问与反思力量,是否能够抵达或已经抵达“历史理性”自身合理性的根基?表达创伤、反思灾难的小说中是否包含着“历史理性主义”逻辑的延伸?这种反思“去蔽”的文学创作是否无形中承担着新的“遮蔽”功能?

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向对体现时代创伤、反思历史灾难的中国当代小说的具体分析与考察。

第一节

当代小说中的创伤记忆与价值现象

创伤,是感性个体质疑历史理性时最倚重的支点。

创伤引起的感受和记忆往往是无比沉重的,但它也给我们提供了将认识引向深入的巨大可能性。灾难过后的反思,较之“升平盛世”急管繁弦的颂曲赞歌,或许能更为深刻地揭示“人的存在”的本质状态。然而,在众人心中烙下深重创伤的灾难,只不过为一代人的反思提供某种契机和动力,并不意味着反思和表现一定会达到预期的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也不意味着已经达到“无蔽”状态。事实上,记忆和叙述的不同方式,留给后世的想象空间和理解空间是扑朔迷离的,从中可以引出非常重要的价值问题。

西方学者对于记取历史灾难的方式所作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照。朱迪斯·米勒在分析“大屠杀的意义”时颇为深刻地指出:“大屠杀的意义”,是不能靠“数字和术语”来论证的,只能靠一个人,一个人的显现,“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